

# 生命历程视角下社会变迁 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影响

丁 彤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424)

[摘要] 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的分析视角,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将一对农民工夫妇进城打工的20年历程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考察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行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社会变迁使得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从强关系为主逐渐转化成弱关系为主。

[关键词] 社会变迁;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生命历程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15)07-0117-05

DOI:10.14129/j.cnki.forwordposition.2015.07.026

##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量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随后人数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后期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民工潮”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建设<sup>[1]</sup>。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农民工是现代中国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与城市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深刻分析农民工流动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络,是准确把握这一群体社会行动的重要基础。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说,深度剖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发现其大多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构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地缘结构十分浓厚。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老乡成为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之一,同乡关系成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凭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获得信息和支持,同乡关系是其进入城市、融入城市、扎根城市的主要途径。现有的调查资料表明,有65.8%的农民工是

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靠这种途径在城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农民工近75%<sup>[2]</sup>。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正以空前的力量在解构并重塑这个社会。这一历史过程无疑也对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同时,同乡因素在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程度是否也发生变化?同乡因素在农民工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的影响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社会变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这无疑都值得反思。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近三十年来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客居他乡的农民工同乡关系网络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种因素使之所然?为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一对农民工夫妇生命历程的研究,来揭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同乡因素的影响程度。

## 二、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

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途径和方法。邹新树(2005)根据“推-拉”理论认为农民工个体向城市流动就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进奉贤专项资金项目“奉贤区劳工与移民问题研究”(编号:WE1325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丁彤,女,河南郑州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人口学。

业是市场中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亲属、朋友、邻居以及亲属的亲属、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组成的社会关系是城市拉力之一，因此会形成“老乡现象”。<sup>[3]</sup>李树茁等人（2007）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现阶段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关系构成仍以强关系为主。<sup>[4]</sup>钱芳、陈东有（2014）等人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更高。<sup>[5]</sup>冯建荣（2011）指出，乡土网络为基础的强关系依然是农民工寻职的主要方式，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寻找工作，为“陌生人世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sup>[6]</sup>综合来看，以往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果中，大多从横向的角度、以农民工群体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的特征及作用，认为社会支持网具有以强关系为主的乡土特点。

这种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一个截面时点的农民式社会关系网络较好的认识，但它难以满足我们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在纵向维度上的审视，对于进城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生命历程理论可以为我们剖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提供一个纵向分析视角。鉴于此，本文试图借鉴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视角，以深度访谈为主的个案研究方式，对一水果商铺夫妇进城务工20年的生命历程进行研究，分析农民工同乡因素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影响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并尝试对这种变化进行解释。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生命历程理论在国外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埃尔德教授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首次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国内生命历程理论兴起较晚，上世纪90年代，以李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首次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在中国转型时期国人生命历程与中国体制、教育与希望工程等重大事件的关系。随后包蕾萍、李钧鹏、常春梅等人发展了我国的生命历程研究。现如今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都相继出现了不少生命历程的研究。目前社会学学者也开始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社会转型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等问题。邓建伟、董潘（2001）则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分析三峡移民问题<sup>[7]</sup>；张红（2008）从一种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sup>[8]</sup>；袁松（2009）等人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了农民工外出打工到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比较分析不同生命组的农民工<sup>[9]</sup>。

所谓生命历程，大体是指按时间顺序，把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事件和所扮演的角色排序所构成的生命序列。生命历程研究主要是指

探寻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历史背景和重大事件对个体的行为及心理的作用及影响。埃尔德曾提出个体的生命历程被时间塑造着，并且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比这一事件本身更具有价值。<sup>[10]</sup>生命历程理论把个人镶嵌到社会背景中去，着重强调时间和事件的重要性，将微观和宏观的分析角度相结合，研究个人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水果商铺的农民工夫妇，把同乡因素作为一个事件，将其放在调查对象的生命历程中来考察。运用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的定性研究方式收集资料，调查小组先后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对被调查者前后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1.5~2小时之间，尽可能把访谈安排在店铺生意不忙的时间段，调查员以顾客或熟人的身份接近访谈对象，增加被访对象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询问相关问题。同时，调查员也在其生意繁忙的时间到店铺帮忙，参与到访谈对象的日常生活，观察与周围商铺的关系，补充和证实访谈资料，结束后调查员整理访谈笔记和观察记录。

### 三、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

生命历程理论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强调出生组效应和地理效应，历史力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水果店夫妇W俩皆于1962年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郸城县面积1490平方公里，人口132.89万，耕地163.7万亩。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逐渐消退，国民经济逐渐复苏，补偿性生育使得1962年的出生率增长到37.01‰，1963年的出生率增长到43.37‰（该年共出生人口2959万）<sup>[11]</sup>，掀起了一波“婴儿潮”。通过采访我们得知夫妻俩的家庭条件都一般，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丈夫是家中老大，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以种植玉米和蔬菜为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两人只有小学文凭。农村生活仍然非常看重乡土性的亲缘地缘关系，特别像婚姻这种大事，十分注重地缘因素，认为“亲家离得越近越好”。夫妇W都在同一个村子里，25岁时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认识，见了两三次面后就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了。

郸城位于河南省东部，其为豫东平原，与安徽省接壤，被誉为河南东大门。郸城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处，三条省道交汇于此，西邻周口港可通长江直达长三角，便利的交通给农民工的外出打工提供了便利。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

济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物质诱惑吸引了中西部的贫困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成群结队地进入城市，夫妇 W 便是其中的一对。

在夫妇 W 的经历中，同乡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不同的。据研究对象回忆，大概是在 1992 年他们 30 岁左右，第一次和同村的三四家老乡一起结伴来到山西省太原市。之所以选择太原市是因为“那里之前就有老乡在，想这样也方便有个照应”。他们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和几家老乡合租一个院子，老乡成为他们生活工作中主要的求助对象。“刚开始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都靠老乡了，什么租房子、找工作啊，都要靠老乡帮忙。在那俺俩就卖蔬菜，也是老乡告诉我哪里进蔬菜，在哪卖生意好挣钱多……”

同乡因素对推动夫妇 W 第一次进城打工作用很大，间接指导着他们在城市迁移的时间和方向。起初 W 夫妇只具有进城打工的动机，同乡陪伴把动机转变为行动。选择山西太原市作为目的地也是因为老乡的缘故，希望以后可以“有个照应”。刚来到太原市，住房和工作依靠老乡的帮助，社会关系网络也仅限于同乡关系。在此时期农民工获取资源和信息主要通过初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同乡关系是其主要的社会资本，更倾向于关系信任而非制度信任。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世世代代都在家族的土地上耕种，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流动的可能性，因此更多地是从社会本身的不流动来得到信任<sup>[12]</sup>。当农民走向城市，熟悉的亲朋好友被陌生人取代，周围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内心的不安全感，因此需要从原有的传统社会中尽可能寻求安全感。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就业信息不完善，就业制度不健全，加大农民工到陌生城市扎根的困难性，而同乡的帮助是最佳选择。

后来因山西省的经济水平较落后和环境污染等原因，夫妇 W 在太原市工作了将近一年就和几个老乡一起回到家乡了。但是在 35 岁左右的时候，迫于三个孩子（后两个是在回乡之后生的）的抚养压力和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他们再次和几个老乡一起去大连市务工，这次选择大连市是因为“正好有一个老乡在大连市，干的还不错，我们和几个老乡就准备过去找他”。到大连市之后，夫妇两个人租了房子，虽然没有和同乡住在一起但几家挨得比较近，平常有事也可以帮忙。“其实平常有事邻居帮助比较多，在一个菜市场的朋友也比较熟。”

35 岁左右的时候夫妇 W 第二次进城务工，同乡因素依旧影响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但相比于第一次山西打工其作用力在下

降。这次选择大连市也是有老乡的作用，平时老乡之间来往频率高、互动多，但与此同时和周围商铺的交往也在渐渐地加强，弱关系网络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次级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工具性行动”（林南，1989）支配农民工根据异类互动原则，寻求与异类互动的机会去增加还没有被个人支配的有价值的资源。<sup>[13]</sup>在最后夫妇 W 返乡时，也有一些同乡继续留在大连市，彼此的社会网络都不仅限于同乡关系，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地扩大。

后来由于大连市天气太冷的原因，工作了大半年后夫妇 W 最后还是选择返乡。大约在 1999 年，丈夫弟弟打电话告诉他们“上海奉贤这边有大学好做生意，而且物价也比较低，租房子也便宜，他问我要不要来……”通过弟弟的介绍和提供的资源他们准备到上海卖水果。到了上海后单独租了房子，后来还把孩子接过来了。但是这次进城经历老乡的来往就很少，“现在在上海，老乡也没有多少了，原本奉贤也有几个老乡，后来就慢慢不联系了，没有之前亲了，现在都各干各的，平时挺忙的，都是想好好挣钱，来往的也少了”。但与此同时，城市里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到了这边吧，周围人好多都是安徽的、上海的、江苏的，也有几个河南的。他们人都挺好的，我们关系也很好，没事也可以聊聊天”。

37 岁左右的时候，夫妇 W 第三次进城打工，这次同乡因素作用就十分有限。虽然是在弟弟的介绍下、血缘关系的作用下来到上海奉贤，但来到上海之后夫妇俩独自租一间房子，与弟弟和同乡的联系很少，一年中和弟弟见面也不过一两次。后来也有几个老乡陆陆续续来到上海奉贤，但平常也没有往来，也不清楚他们居住的地方，偶尔也会有老乡来买水果，闲聊几句。现在夫妇 W 遇到困难往往会向周边商铺寻求帮助，平时晚上也经常和周边邻居打牌、聊天打发时光。我们在参与观察中，也注意到商铺间关系不错，闲下来时也会偶尔开几句玩笑，聊聊家长里短，如果一家有事其他人也很愿意帮忙，并没有出现来自同一个省份的老乡关系会更好的现象。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在初级同乡网络，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弱关系的作用将不断扩大。想要在城市中立足，完成“农民工”到“城里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转变，农民工需要构建以初级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以工具性为取向的新型次级社会网络。<sup>[14]</sup>

#### 四、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影响因素

从 1992 年开始至今，研究对象夫妇 W 经历了从山西到大连市，再从大连市到上海的农民工城市打工历程，期间同乡关系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也在不断地变化，以血缘和地缘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转变成以业缘为基础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生命历程理论告诉我们，这种变化是历史力量、时代特征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夫妇 W 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们在 1992 年第一次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第一代农工潮，这一现象曾被《美国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sup>[15]</sup>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新阶段，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开放大门逐步走向世界。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21 世纪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元包容等社会风气的不断形成，引导着农民工工具性选择和理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现代农民工思想更加开放，要求平等、尊重、理解，以地缘、血缘为依托，重视业缘交往，交往功利性增强。<sup>[16]</sup>市场经济和利益机制增强了农民工价值目标的自我性和务实性，冲击着传统的乡土价值观。观念的变化指导着行为的转变，农民工更加注重自我的长远发展，群体观念相对减少。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带动了农民工融入城镇，身份认同感和成熟归属感相应增强，安全感上升，与城市居民、同行业从业者的心理距离随之减少。

相关国家政策和制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工的关系网络。最典型的中国“二元制”城乡格局和严格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平等交往，增加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和困难，农民工来到城市始终感觉自己是“过客”，很难转变自己的身份，因此，只有通过强关系同乡网络来获取信息和帮助。近年来，我国不断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2000 年农村税费改革、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等都带动了农村的发展，是政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中指出，准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sup>[17]</sup>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城乡一体化推进时期，农民工参

保率不断上升，非城市户口也可享受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和福利待遇。下表为根据《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制成的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的表格。

表 1 2008—2010 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养老保险	9.8%	7.6%	9.5%	13.9%
工伤保险	24.1%	21.8%	24.1%	23.6%
医疗保险	13.1%	12.2%	14.3%	16.7%
失业保险	3.7%	3.9%	4.9%	8.0%
生育保险	2.0%	2.4%	2.9%	5.7%

2014 年 2 月 7 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增强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互动的积极性，弱关系的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方针，完善基础设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服务。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 2003—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 号）和 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 号）要求各地方行政部门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就业环境，加大农民工的培训力度。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劳动合同法》，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规范用工关系、保护权益依法维权、减少社会歧视等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健全的劳动就业机制和法律制度增强了现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安全感，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越来越多，遇到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会寻求政府和法律的帮助，强关系网络作用逐渐减少，弱关系网络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实这几年想想，和老乡的关系慢慢淡了，现在在这个城里过得挺好的，很多事情靠邻居、靠政府都可以解决，也不像刚来城里的时候，都指着老乡帮一把。”

影响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身份的态度。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和传统观念的作用，一部分居民歧视农民工，存在身份优越感，不愿意与农民工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sup>[18]</sup>长此以往，农民工倾向于过度依赖同质性很强的强关系社会网络，这与他们融入城市的困难性是有一定关联的。近年来，现代化的风气越来越开放多元包容，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接纳农民工。2008 年刘林平学者曾做过一次关于广州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及其对农民工态度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伴随

着中国政治社会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二元体制下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市民更加理性地看待和接纳农民工,接近四成的人无条件赞成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落户,相当多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力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等权益。<sup>[19]</sup>一项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05年,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从39.2%上升到41.3%。<sup>[20]</sup>随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不断加深,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和城市关系越来越远,和农村关系逐渐疏远。“城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得好了,还有很多老师同学来买水果时和我们闲聊几句,也有人给我们送过东西。”

###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一对农民工夫妇20多年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生命历程,从生命历程的动态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生活中同乡因素影响程度的纵向变化。W夫妇从1992年第一次进城开始,外来务工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20多年经历了三次转折点,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在发生着变化,基本上是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缩影,同乡的作用在不断减少,城市农民工乡土气息慢慢减退,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弱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对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距离,加强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作用。

以往关于农民工社会关系的研究大多以横向视角分析,以强关系网络为重点,突出强调其在“熟人社会”中凝聚和团结的作用,抵抗农民工进入城市“陌生社会”后所面临的冲击,亲戚、同乡所组成的“情感性”强关系网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最主要的屏障;不过本项研究认为,这种横向研究视角存在解释上的局限性,不能充分阐述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变迁过程。而生命历程理论运用纵向分析视角,能够较好地展现个体生命阶段的动态发展变化。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考察了城乡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交往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当代农民工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强关系网络的作用在不断减弱,业缘为主的“工具性”弱关系网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本项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国家和政府应注意到新时期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趋势,着力制定相关政策以积极引导农民工充分就业,完善劳动市场与信息制度,妥善解决用工问题的劳资纠纷,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同工同酬,减少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此外,各级政府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增强农

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最后,地方政府还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基层管理和保障功能,密切关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主动提供帮助;积极开展相关社区活动,加强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社区。

### 【参考文献】

- [1] 司睿.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个案研究[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2006.
- [2] 蔡昉.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3-205.
- [3] 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农村经济,2005(10).
- [4] 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5] 钱芳,陈东有.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 2014(1).
- [6] 冯建蓉.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变的社会学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 [7] 邓建伟,董藩.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的三峡移民问题[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 [8] 张红.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市民化——一种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08(8).
- [9] 袁松,余彪,阳云云.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J].青年研究,2009(4).
- [10] 邹佳,周永康.国内关于生命历程研究的综述[J].青春岁月,2013(5).
- [11] 张翼.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J].广州大学学报,2006,(8).
- [12] 司睿.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个案研究[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2006.
- [13] 惠志娟.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以广东省为例[D].安徽:安徽大学,2007.
- [14] 叶传忠.现阶段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J].企业导报,2009(11).
- [15] 何晓红.一个女性农民工的30年进城打工史——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1(5).
- [16] 何瑞鑫,傅慧芳.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06.
- [17]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EB/OL].(2014-07-30)[2015-05-0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
- [18] 刘丽芳,李小波.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浅析[C].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政策研究”分论坛论文集,2011.
- [19] 刘林平.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J].中山大学学报,2008(2).
- [20] 卢国显.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J].浙江学刊,2007(6).

(责任编辑:吉雅)